

# 王国礼仪公共性的扩展

## ——简论古代华夏族群的形成途径

颜世安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7)

**摘要:** 古代华夏融合由夏商周三代王国政治推动完成, 这一点已为学界公认。但华夏融合的具体途径是什么, 仍有待深入研究。三代王国皆耗费大量物资建设象征权力的王国礼仪, 王国礼仪为王族独占, 但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某种公共性, 即由各姓族集团贵族分享, 可以在前后不同王族之间传递, 由之而渐成跨越姓族藩篱的文化圈, 此文化圈便是春秋“诸夏”认同的基础。古代华夏融合不同于现代民族认同, 后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过程, 前者主要是社会上层贵族参与的过程。

**关键词:** 王国礼仪; 公共性; 华夏族群形成途径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06)06-0127-06

华夏族群的凝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术界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夏商周三代为华夏凝聚形成的时期。华夏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族源, 是由来自东、西部的若干姓族集团在黄河中游争夺王权和建立王国构架的过程中逐步融合而成的, 至春秋时产生华夏的认同。但是, 王权的争夺和王国构架的建立如何一步步推动华夏共同体形成, 此一问题却一直缺乏具体研究。本文认为, 古代华夏聚合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 后者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过程, 前者却主要是社会上层贵族参与的过程。针对此问题, 本文提出一个观点: 王国礼仪公共性的扩展, 希望由此观点入手, 能较为具体地追踪华夏族群凝聚的过程。

### 一、三代王权与王国礼仪

夏商周三代在黄河中游建立王国, 以王国政治构架控制四方不同姓氏的邦国。这种控制推动姓族之间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活动, 便是以贡赋、征战、赏赐一类政治行为调动不同族群之间的物资交流。《尚书·禹贡》讲夏王国统治下政区的划分, 各区的土质与贡品, 那虽是晚出的作品, 不足以据之讨论夏代的情况, 但是《禹贡》反映的夏王族与四方邦国之间有政治从属关系和纳贡关系, 当不全是空穴来风。商代有较发达的贡赋系统, 从殷墟卜辞可以证明。卜辞大量记录商王吸纳四方各种贡物, 种类繁多。商代物资大规模向

收稿日期: 2006-08-03

作者简介: 颜世安(1956—), 男, 山东曲阜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周至春秋: 华夏民族凝聚过程研究》(04DZS006)的阶段性成果。

王都集中在考古上也得到证实。

三代时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物资交流是否有贸易活动在起作用?当然是有的,古代部族之间不可能没有贸易往来。但是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看,三代时期的贸易活动都不甚发达。中国古代商业兴盛是在春秋战国以后,西周以前则商贸活动痕迹甚少。战国时的文献大量记载古代圣贤英雄传说,这些故事传说中基本没有商业活动的记录。在古代城市考古中商业活动的遗迹也极少,以商代为例,安阳和郑州商城的发掘,发现宫殿建筑遗址、墓葬区、手工作坊遗址等,惟独没有发现市肆的迹象,也未发现与商业有关的遗物。<sup>[1](P211)</sup>三代时期商贸活动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和范围尚待研究,但三代的物资交流主要通过政治途径而非贸易往来,现在是考古和古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三代时期不同区域之间物资交流主要由政治力量推动,王族通过权力集聚大量物资,除了用于生活消费,用于构筑城池宫殿、武装军队以捍卫王权,便是用来营造象征权力的礼仪系统。王国礼仪大体分祭祀礼仪和政治礼仪两类,在祭祀礼仪中,王室独占祭天的权力<sup>①</sup>,通过大型祭典,包括使用精美的礼器如青铜器和玉器,以象征其地位权力得到天的认可。在政治礼仪中,王室通过一系列仪式安排,诸如分赐旌旗服饰铜器玉器戈予一类器物,在贵族成员之间传递和分享权力。祭祀礼仪和政治礼仪当然只是大略的二分,严格说来,王国礼仪最核心的部分是祭祀礼仪,因为在天意支配一切的宗教信仰时代,与天沟通的能力是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可以肯定,三代时期王族集聚大量物资,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来营造王国礼仪,包括仪式的训练演习和为这些仪式准备诸如青铜礼器一类的精美器物。春秋时代的人常会带着感情回顾赞美古代王国政治鼎盛时的情形,其中有一种说法,就说古代的王者和国君生活简朴,却把全部物资用于祭祀和政治的礼仪。如《左传》鲁隐公五年,鲁国贵族臧僖伯劝阻隐公赴棠地观赏捕鱼以为游乐,就说:“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

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论语·泰伯》篇孔子赞美禹:“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这样的赞美想必是有夸张,但应该是有根据的。祭祀仪式和政治仪式的象征意义对王族政治权力如此重要,王者不会不倾力营造这个系统,这与道德无关,是掌握王权所必须的。张光直讨论三代政治,认为王族独占宗教、仪式、艺术、文字等文化手段,是独占政治权力的保障。他并且认为古代王权竞争者是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首先是青铜器)来达到对宗教、仪式等的独占。<sup>[2](PP79-81)</sup>这个判断在考古和古文献中均可得到证据支持。商周考古掘得许多青铜器,其主要部分就是用于祭祀仪式的礼器。古代铸造青铜器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然而青铜器的制作却主要不用于生产生活的实用领域,而是用于宗教礼仪的领域,可见古代王者聚拢物资,很大程度上确像臧僖伯和孔子说的那样,不是用于生活消费,而是用于建设仪式,“纳民于轨物”。

文献中也多曾说到青铜器对于王权的象征意义,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资料,就是《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带兵路过周疆问周鼎轻重,王孙满代表王室所作的回答:“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修。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夏代以远方贡金铸造九鼎,上有四方物产图象,这九鼎连同图象就有“协于上下”的功能,以承受天赐王权。夏王失德,鼎归于商,王权亦归于商;六百年后商王失德,鼎归于周,王权亦归于周。这就是以九鼎及其艺术文饰为王权之象征。由此可见三代王室建立仪式文化对保障王权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九鼎当然只是代表性的器物,象征王权的仪式文化还包含大量其它器物,如玉器、骨器、服饰、酒醴等,孔子称赞大禹的三句话,“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除最后一句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关,前两句话其实是概括了古代王政集中物力建设仪式文化

<sup>①</sup>《国语·楚语》“绝地天通”一章,研究古代思想的学者都很重视,这一章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讲古代王者独占祭天的权力。

的特征。

## 二、何谓王国礼仪的公共性

夏商周三代通过政治权力聚集物资,建设以祭祀为中心的仪式系统,目的当然是垄断王权。张光直研究三代政治,特别强调王族对文化手段的独占。<sup>[3][2]</sup>夏商周三代王族独占仪式文化以垄断权力的特点,对于理解三代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要指出问题的另一面,即三代王国礼仪除了由王族独占,还逐渐形成某种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就是象征王国权力的礼仪系统由不同来源的地方文化组合而成,又逐步地为参与王权角逐的若干强大姓族的上层成员分享。王国礼仪的公共性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三代时期王国礼仪不断累积丰富,王族独占礼仪系统的意志也愈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王国政治构架日渐复杂,王国礼仪的公共性也一步步扩展。王国礼仪的独占性和公共性之间有复杂的矛盾和依存关系,上引《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谈论九鼎,主旨是要强调王族凭其“德”对九鼎独占,但在他的话中,不经意之间也透露出九鼎有某种公共性特征。

王孙满所谈到的九鼎的公共性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王孙满说九鼎是由远方贡金九枚铸成。关于青铜器铸造的矿物来源问题,现在考古学界似乎尚无定说。但不论怎样,“贡金九枚”作为一个象征的说法肯定是对的。构成王国文化的庞大物资系统,不可能是王族直接控制的一个部族集团的劳动产品,其中许多物资定由政治权力从远方征集而来。《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率北方联军伐楚,管仲指责楚国的罪名之一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洒”,就是说周王祭祀用的青茅是由楚国贡入。这种吸纳四方物资建成王国礼仪的做法肯定相沿成习,才有王孙满以远方贡金铸成九鼎那样的说法。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王室分赐各支建立远方封国的诸侯以大量礼仪性器物,这些礼器都是王国礼仪的一部分,分赐诸侯象征王权层级性的分割。《左传》定公四年卫国祝佗回顾周初分封,说到

鲁、卫、晋三国分赐的礼器,鲁国有大路、大旌、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卫国有大路、少帛、綉菴、旃旌、大吕,晋国有大路、密须之鼓、阙鞞、沽洗。在这些礼仪性物件中,说出原国家和地域来源的就有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鞞。可知这些物件非周人自产,其它物件未明言来源,想必也有相当的方国贡品或战胜劫掠来的物资。这是贡金九枚铸成九鼎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由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知,王国礼仪是王族独占的文化,可是来源和成份却有公共性,不可说成王族一个姓族的文化。例如商代的王国文化可以是商王朝的文化,却不可以说是商族的文化,尽管它被商王族独占。

王孙满说到的九鼎公共性质的另一个方面,是九鼎在不同王族之间传递,“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九鼎的传递象征王国文化虽为一个王族独占,它却不是王族的私有物,当一个王族衰败时,另一个王族可以继承前朝的礼器仪式。王国礼仪象征权力,由此却成为不同地域、文化来源的姓族集团争夺的对象,争夺王权靠武力,成功的标志却是夺取王国礼仪。夏商周三代王国礼仪之间的传递和继承,许多古文献都曾提到,如《论语》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记·礼器》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淮南子·泛论训》说:“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这种文化继承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确认。夏与早商之间文化承继关系还不是十分明显<sup>①</sup>,商与周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则十分明确,西周初年几乎全盘继承商王国的仪式文化,这一点已从多方得到证实。刘雨考定西周铭文中出现的20种祭祀礼仪,除3种次要礼仪以外,其余17种都见于晚商卜辞,为殷周同名。这17种祭祖礼大多盛行于穆王以前,穆王以后周人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礼仪系统。<sup>[4]</sup>周初用商礼仪,这一点连周初文献也不讳言,《尚书·洛诰》说“王肇称殷礼,咸秩无文”,《大雅·文王》说“殷士肤敏,裸将于京”,殷的遗民在王都助祭,所

<sup>①</sup>邹衡考察夏与早商文化异同时指出,偃师二里头宫殿的殿堂基地与湖北黄陂早商房基大小几乎相等,显然是后者承袭了前者,但从整体建筑布局看,早商与夏的宫殿却有所不同。夏文化中有成批的玉器、石器,与早商没有太大区别,显然也是后者承袭前者,可是早商的青铜礼器绝大多数未见于夏文化。邹衡:《试论夏文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行之礼必是殷礼无疑。周人袭用殷商礼仪,自然是连仪式所用的礼器系统一起袭用。郭沫若曾说,周人原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现在传世的西周青铜器很多,但武王以前的器一个没有,武王以后勃然兴盛起来,分明是表示周人因袭了殷人的文化。<sup>[5] (P18)</sup>《左传》王孙满说“鼎迁于周”,《逸周书·世俘解》说武王克商以后“俘商归玉亿有百万”,这都是周初仪式器物转入周人之手的部分记录。王国礼仪在传递之中当然会有所改变,去掉某些东西,加进某些东西,孔子称之为“损益”,加进的东西是新王族的礼仪,但这些礼仪汇入王国文化仪式系统以后,它就不是王族一个姓族的独有文化,而是王族独占的象征权力的公共文化。研究考古和古文字的学者相信,西周初期的仪式文化基本是商文化的延续,到了周穆王以后,大体共、懿的时代,仪式文化有明显的转变,新的祭名出现,祭器的组合风格改变,青铜器的文饰风格,文字的书写风格都有较明显的变化。<sup>[6][7]</sup>这种变化可说是周文化的风格开始形成,但是不能说是周族的文化取代商族文化。西周中期以后的文化,是周人对商王国文化“损益”以后形成的新王国文化,它的基本成份仍是延续商的文化传统而来。春秋时中原各国贵族认同的“周礼”,就是西周中期以后形成的以商周融合为主的仪式文化,而非周取代商的仪式文化。由此可知,“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两句话背后有一个王国礼仪在三代间传承的历史线索。

王国文化的公共性还有一个形成途径,王孙满谈论九鼎时没有说到。这就是在三代王权的发展中,王族以外的异姓集团,其中有王族的同盟、婚姻,也有古老的方国因为控制某一区域而受到王族笼络,这些异姓集团的上层成员会有机会程度不等地分享象征王国权力的礼器。这种异姓分享不是因为王族愿意开放权力,而是因为随着国家制度发展,政治构架日趋复杂,王族为巩固统治,不得不分赐某些仪式,以建成比单靠武力讨伐更高级的控制网络。王国文化的分享和分层占有在三代时期是逐步形成的,夏代的情况现在不明了,商代肯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分享。《商颂·长发》说:“汤降不迟,圣敬曰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受(授)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受(授)小共大共,为下国

骏厯,何天之宠。……”这是后人追记商汤时的情况,说汤的降生恰逢其时,他能敬事上帝。上帝命他作九州的范式。他赐给四方的小国珠玉,做成下国君主冠前悬垂的玉帘;他还赐给下国君主玉块,作为他们的信圭。<sup>[8] (PP531-532)</sup>后人的追记少不了夸饰,但商王赐四方诸侯宝器以认可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当实有其事。有学者归纳商代出土器物,指出商代的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陶器和兵器存在很大差异,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可是青铜礼器却基本相似。<sup>[9] (PP771-772)</sup>这一现象是如何造成的还有待研究,但是各区域之间礼器趋同,一定说明象征权力的仪式文化在各区域的上层社会流传,较日常生活器物在下层民众间流传要快得多。上层礼器与下层生活器具在流传上的这种差异,在商周之交文化延续上也分明表现出来。西周初年铜器几乎全盘接受商人的青铜文化,后来才逐渐发展出周人风格的铜器。陶器则不同,西周早年和晚商的陶器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sup>[10] (P80)</sup>王国仪式文化向各方国的扩散在西周表现的最明显,西周的分封制度,以周王国的政治组织统一各方国上层,这是商王国所没有做到的,随着政治统一,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各诸侯国一致认可的“周礼”。周礼是周王国的政治控制网络,同时也是王国仪式文化扩展而成的文化圈。春秋时的“诸夏”认同,正是以此周礼文化圈为基础。

### 三、华夏融合的途径

华夏民族的抟成,基本动力是若干来自不同区域的部族集团进入黄河中游争夺王国统治权,然后三代王国以政治权力积聚物资,推动各姓族的交往。虽然相关文献甚少,对于三代王国以政治构架推动各姓族集团逐步融合的详细过程,现在已经无法全面了解,但是根据少量文献资料和出土文字器物,我们还是能对三代时期华夏聚合的主要线索有所认识。这个线索就是,华夏的聚合本质上是一种上层文化的聚合,是王国礼仪文化逐步扩大,礼仪文化的公共性逐步被参与王权角逐的各大姓族上层贵族认同,由此形成跨越姓族血缘藩篱的文化共同体。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三代时期的华夏融合,我们切不可理解为

类似现代民族国家构架之下发生的民族融合。现代民族融合与认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认同,古代华夏族群的融合与认同则只是社会上层成员(王族与异姓贵族)的文化认同。现代民族国家构架之下的民族认同需要一些重要的社会条件,诸如文字和教育普及,印刷读物的广泛流行,社会流通打破社会的阶层障碍和身份壁垒等等。有了这些社会条件,普通民众才有能力在观念和感情上认同一个空间广大的区域和数量庞大的人群。夏商周三代王国时期,社会底层成员的生活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他们生活在王国礼仪圈之外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祭祀,有自己的礼俗,但这是地方性的习俗,不仅与上层贵族精美的礼仪隔膜,也无从引导普通民众认同一种跨种族的文化。王国礼仪由王族积聚物资建成,它的本意就是少数人垄断与天交通的资格,显示天赐王权,在同姓及异姓的上层建立仪式性的权力分层,这样的礼仪文化当然不会向社会普通成员开放,由王国礼仪扩展而成的文化圈也不会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文化圈。

有关文化上下层之别,文献记载不多,但仍有踪迹可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这举动引出当时人的一段回忆,据说百年之前平王东迁时,周的辛有去伊川,看到有人“披发祭于野”,他就感慨说,这个地方大概以后要被戎狄占领吧,因为“其礼先亡矣”。这故事是僖公年代的人编造的还是平王东迁时确有其事,且不去管它,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故事中上下层文化的分别。辛有看到人“披发祭于野”就说礼已经亡了,难道“披发祭于野”就不是“礼”?在礼俗(convention)的意义上当然是礼,可是这种礼俗却与上层的礼格格不入,上层的礼是礼仪(ritual),是有三代王国积聚物资长期营造的背景,是一套象征权力的仪式。受上层礼仪熏陶的贵族当然不能承认“披发祭于野”的家伙有“礼”,反过来,“披发祭于野”的民众(并非游牧的夷狄)也不会了解上层礼仪文化。所以三代王国时期华夏的聚合基本上是一个上层文化的故事。宋襄公争霸时干的事也颇说明文化上下层之别。宋襄公在齐桓公去世以后争夺霸权,主要的方略就是以“礼义”号召

中原诸侯。可是他为了笼络东夷,借助夷人的力量,就尊东夷礼俗杀郟子以祭“次睢之社”。东夷与诸夏之别很容易被理解为不同血缘族群之别,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分层之别。宋国殷人后,殷出自东夷,原与东夷有族源关系。但殷王族建立了王国,其后代在周王国下分享王国礼仪,属于“周礼”文化圈的成员,这就与东夷分属不同的文化层,以至宋襄公不得不用两种不同的手段笼络两个不同文化层中的人。考古材料中有时也可见出上下层文化的分野,不同区域的文化融合主要是礼仪性文化,而非日常用具的器物文化。前引徐良高论文研究商代青铜文化圈,指出商代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陶器与铜兵器差异很大,分属不同文化类型,周边的青铜礼器却与中原青铜礼器趋同,基本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又邹衡论文指出西周初年铜器几乎全盘接受商人青铜文化,陶器则不同,西周早年与晚商的铜器完全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铜器与陶器在三代考古文化中指示作用相对明确,铜器多用作礼器,为上层器物;陶器当然上下层均会使用,但甚少用作礼器,视为上层礼仪圈之外的器物肯定没有问题。

有一点需要说明,所谓下层文化,因为资料所限,目前知道很有限。上下层分别的界限是什么,也不能很明确。王族和异姓大族的同宗下层成员能否分享王国礼仪?这问题就似乎难以一概而论。若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春秋时“国人”大体皆可参与“祀与戎”来看,则国人皆可分享上层礼仪文化。可是鲁国的国人至少有相当部分为殷人之后,他们在“亳社”祭祀,似乎与周礼不是一个系统。<sup>①</sup>国人的地位如何,是否可以纳入王国礼仪文化的圈子,此问题仍待研究,但是华夏文化融合基本是一个上层文化圈的融合,这一点可以肯定,只是“上层”的外延有多大,尚不能确定,在本文的使用上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我们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有资格分享王国礼仪的人群。

现在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夏商周三代王国以政治构架推动各姓族之间交往融合,这个过程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各姓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参与。三代时期的华夏融合,就其主体而言,实际上

<sup>①</sup>《左传》定公六年,阳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是参与王权争夺的各个氏族集团上层逐步接受象征政治权力的仪式文化,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曲折的,至西周分封以后才大致形成统一的上层礼仪,再经二百年陶铸,终于在春秋时发生“诸夏”的认同,形成跨越宗族关系的文化族群。这样说不是完全否定不同氏族之间、不同文化区域之间基层民众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这样的交流与影响肯定是有的,并且也是受到王权争夺和王权变更一类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但是三代时期不同氏族集团的文化融合,主要发生在有机会分享王国礼仪的上层社会成员之间,这一点可以肯定。华夏漫长的融合至春秋完成初形,此一过程主要得力于王国礼仪公共性的扩展。春秋以后,氏族组织解体,不仅各国上层政治构架趋同,文化观念、文字相互打通,而且各国的基层组织亦逐步行政化,至战国秦汉时才有华夏共同体形成。然而即使在秦汉时的华夏共同体中,社会底层民众是否能像上层成员(政府官员和学者)那样认同整个帝国为自身所属的共同体,此问题仍有待研究。

#### 参考文献:

- [1]陈旭.夏商周文化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2]张光直.美术、祭祀与神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 [4]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J].考古学报,1989,(4).
- [5]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6][日]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 [7]尹盛平.周原文化与西周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8]高亨.诗经今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9]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研究”[A].商文化论集: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10]邹衡.论先周文化[A].夏商周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怀 双

## Expansion of Public Kingdom Rites

### —Ways for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Huaxia race

YAN Shiran

(Historical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merge of ancient Huaxia was promoted by the politics of Xia, Shang and Zhou Kingdoms, which has been commonly accepted. However, it is open to study as to the ways of merge. The three kingdoms spent huge materials developing rites as the symbol of power. The rites were firstly owned by the imperial clansmen but became somewhat public in the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i.e., shared by the noble of various clan and passed down differently in imperial clansmen and thus became a cultural circle without the barrier of clan, which was the basis identified by the dukes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Merge of ancient Huaxia is different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of modern nationalities, the former be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upper class while the latter all social members.

**Key Words** Kingdom Rites; Public; Ways for the Formation of Huaxia Race